

歷史空間

「唐宋八大家」治水有功

戴永夏



曾鞏 網上圖片 王安石 網上圖片 蘇軾 網上圖片

最近，首都北京下了一場暴雨，霎時間大街上積水沒膝，濁浪滾翻，地鐵進水，車輛被淹，整個城市交通嚴重癱瘓。這種情況，在武漢、杭州、南昌、成都等城市也相繼出現。從中看出，城市治水是何等重要，也說明我們在這方面存在嚴重隱患。

曾鞏：濟南修建「北水門」

宋神宗熙寧五至六年(1072—1073)，曾鞏被派到齊州(即濟南)任知州。在任時間雖短，但他積極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減輕農民的徭役，除暴安良，整治交通，幹了許多有利民生的好事。尤其對濟南的城市建設，他居功至偉。其中最主要、也廣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門。

濟南的南部是山區，地勢南高北低。一到夏季多雨季節，南部的山連連同充沛的泉水傾瀉而下，匯集到市北低窪處，經常造成水患。正是為了消除濟南的水患，曾鞏一上任就決定修建北水門。

北水門即當年齊州城的北城門，它建在曾鞏為疏導大明湖水而開掘的匯波渠上。城門的規模和樣式，同一般拱形的古城門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門洞下面不是大路而是水道，水道兩邊才是人行道。門洞的偏北處設有水閘；門洞上面矗立着雄偉的匯波樓。它建成後，當城內洪水過大時，便可通過水門中宣洩出去，減少了水害；而當城外的洪水暴漲時，又可關閉城門的水閘，防止城外的洪水倒灌入市內。因此北水門的建立，不但使濟南多了一道壯麗的景觀(「匯波夕照」為濟南八景之一)，更為濟南百姓消除了水患，將水害變成了水利。至今，北水門們依舊發揮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漲，久旱不涸」，任何時候都一片大明。

王安石：「荊公堤」與「穿山楔」

王安石是一位廉潔親民的封建官吏。不論在中央還是地方，他都十分重視水利建設。

宋慶曆七年(1047)，26歲的王安石被任命為鄞縣(即寧波)知縣。上任伊始，正逢大災之年，他便下鄉調查研究，向老農請教減災除害的方法。老農告訴他，鄞縣並不缺水，只是沒有水利設施，既不能蓄水，又無法排澇，所以非旱即澇，災害頻仍。王安石聽了老農的意見，上任的第二年就組織民工興修水利。他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行程一千多里，風餐露宿，不辭辛勞，實地調查，為各處水利建設作出規劃。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全縣興修水利設施21處，大大提高了抗災能力。

鄞縣靠海，當地百姓飽受海潮侵襲之苦。為此，王安石主持修築了一條從孔聖嶺下河頭、焦村，經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這條海塘全長15公里，有力地阻擋了大海湧來的狂瀾，保護了田間的農田，鄉民將其稱之為「王公塘」或「荊公堤」。為了進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還帶領百姓開山劈石，修建楔閘。據《鎮海縣志》記載：「宋慶曆年間，荊公王公宰鄞時鑿山為之，築堤捍浦為河，於堤

西石岩鑿三窟為楔，闊三丈六尺，高三丈。」這樣，海潮來襲時可通過石閘控制潮水，解民之憂。百姓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荊公祠於楔左，歲祀之」。

此外，王安石還對東錢湖進行了治理。他組織和率領十餘萬民工，清除葑草，疏浚湖泥，立湖界，起堤堰，決陂塘，整修七堰九塘，限制湖水流出，抵禦海潮侵入，從而解除了湖區周圍及鄞縣、鎮海七鄉農民的旱之苦，充分發揮了湖區的灌溉和漁獲之利。自此，「七鄉三邑(鄞、鎮、奉)受沾濡」，「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憂」，莊稼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

蘇軾：蘇堤、引水兩豐碑

宋代大詩人蘇軾，曾在多個地方做官，也屢遭貶黜。但他每到一地，都關心百姓疾苦，對防洪利民的水利工程尤其重視。

北宋熙寧十年(1077)四月，蘇軾由密州調任徐州知州。到任剛三個月，黃河在澶州決口氾濫，洪水沖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為地方長官的蘇軾臨危不懼，首先關閉城門，制止「爭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時徵發5000民工，搶築一道「首起戲馬台，尾屬城」的抗洪大堤，這就是著名的徐州「蘇堤」。他還親自到武衛營勸募禁軍參加搶險，自己則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帥之，與城存亡」。他夜宿城上巡查險情，屢過家門而不入。臨危時刻，還以詩言志：「坐觀入市巷閭井，吏民走盡盡王尊。」一旦堤防潰崩，他甘願像漢代東郡太守王尊那樣，以身填堤，力挽狂瀾，確保百姓和屬下脫險。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官民團結一致，採取了積極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轉危為安，保住了全城人民的生命財產。

在防洪除害上蘇軾卓有政績，而在引水工程中他同樣建有奇功。如廣州最早的自來水工程，就是蘇軾倡議修建的。

北宋紹聖元年(1094)，蘇軾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在廣東惠州。在那裡，他聽說廣州經常發生瘟疫，認為這是沒有清潔水源，百姓喝不潔的苦鹹水造成的，於是他便給廣州太守王敏中寫信，建議他採納羅浮山道士鄧守安的意見，在廣州修建清潔水引水工程。這一工程要將離廣州20里的蒲澗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體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將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連接處纏以麻繩，塗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來的清水，然後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許多小石槽內，供居民汲取。再專設兵匠數人，定時沿線巡查維修，做好管網的保護工作。這樣一來，廣州城的百姓都可以飲上清潔的山泉水。為了把這件事辦好，蘇軾還積極向太守推舉羅浮山道士鄧守安，說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潔，不貪不佔，熱心公益，很受人尊敬，是負責這項工程的最佳人選。

在蘇軾的積極建議下，太守不負眾望，立即組織人力，動工興建引水工程。蘇軾聽說後非常高興，又寫信給他，建議施工時在每一根竹管上鑽個小孔，用竹釘封上。這樣當竹管發生堵塞時，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於及時疏通。太守虛心採納了這些好建議，使引水工程順利建成，解決了廣州全城百姓的飲水問題。

蘇軾這些好的建議，無疑是廣州人的福音，值得世代銘記。然而他卻在信中反覆交待，千萬不要說這是他的主意。究其原因，固然與他謙虛的美德有關，因為他一向不願宣揚自己。但更主要的，是他深知自己當時是一個「犯官」，深受當權者的猜忌、迫害。如果把自己公開出來，很可能會使這項工程因為他而流產。由此可以看出，蘇軾在興修水利為民造福方面，真是鞠躬盡瘁，嘔心瀝血，一顆心幾乎全部獻給了貧苦百姓。

五胡閒話

李恩柱

容忍度

在清朝統治史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一直都警惕貪腐。放大一點說，不僅清朝，任何一朝帝王都知道貪腐是蛀蝕皇朝根基的惡劣行為，因此大赦天下時都不包括貪官污吏。然而，警惕歸警惕，重視歸重視，貪腐現象仍很普遍。

順治十年(1653)正月二十六日，順治帝到吏部視察，專門談到對官員的考核情況。他對那裡的官員說：貪官何其多呀，這些傢伙平時侵漁小民，當遇大察考官之年，也應當小心謹慎。大學士范文程等人說，貪賄之人未做官的時候，也知道不該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見利忘義、利令智昏。順治說：這都是因平日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如果持守有定，怎麼能被金錢財物所誘惑呢？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二十七日，吏科給事中林起龍給順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摺，也是出於對貪腐的探討。其中說：州縣官員所以貪污有三條原因：一是日用之累；二是媚奉上官之累；三是曲承差使之累。林氏所言著眼於當時的現實。他在奏摺中請皇帝對官員嚴加教誨，使貪官痛改前非，各盡職守。同時樂觀地認為，如此一來則大法小廉，太平可致。顯然，林起龍的話頗合皇帝的心意，順治閱奏後，命令有關部門研究討論。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許可以推測出順治皇帝對貪腐的措施。嚴肅考核，做好思想工作，提高官員待遇。不過，這未必管用。清朝不僅沒有從貪腐的泥沼中掙脫出來，而且順治子孫一代代過一代，難以自拔，和坤大案即為明證。約略說來，和坤一案有三點使平民百姓特別震驚：一是涉案金額之大，二是作案時間之長，三是他與皇帝距離之近。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在《將史法言》中說：「清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和坤專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寶璽、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百萬之多，皆恃和坤為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之氣，盡斬喪於一人之手。」其實，和坤斂財的本領再大，在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面前，也屬於奴才，說拿下就拿下了。況且，任何人也沒有辦法一鐵鑿控一口井，一下子貪污幾億兩銀子，和坤的髒手肯定已經伸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從不被捉。乾隆是何等人物，居然釀成如此局面。不用「姑息」、「縱容」等詞彙，萬難解釋這種奇離古怪現象。

從根本上講，專制皇朝不容易解決一個「貪」字。因為釀造貪腐社會風氣的原因，在於專制制度本身。如果官員的命運是由身居高位的上司決定，而這個上司又只受皇帝本人的監督，實際上一切監督措施只是具文，都不存在了。這就為貪贓枉法之輩千方百計尋求一個手握重權的外作靠山提供了動機，十分自然地，社會風氣、政治風氣也就日益糜爛。古今中外，貪污腐敗為共有的現象，但像清朝後期那樣貪污成為常態，幾乎無官不貪是極其少見的。試想，和坤的貪贓，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盡人皆知，只有乾隆去世後才事發，這個皇朝如何不敗敗！腐敗之事，俸祿低只是一個藉口，哪裡是真正原因。

據說，順治非常崇拜朱元璋。順治十六年(1659)，皇帝定下懲罰措施，曰：貪官贓至10兩者，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內)地方，其犯贓罪應杖責者不准折減。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同樣流徙，贓重者處以絞刑。這些條例，不由讓人想起朱元璋的「剝皮實草」。律令雖嚴，卻仍然遏制不住貪風蔓延。

揭露官員貪污案的多與少，與老百姓耳聞目睹的貪污行為並不是一回事。世人知曉的那些案件都是被曝光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決定曝光幾率，又與反腐體制和容忍度相關。朱元璋留給後人的印象是嗜殺成性，對貪墨者挺殘暴。不能說這樣認識不對，但失之於籠統。其實，在對貪污的容忍度上朱元璋超出大部分皇帝，幾乎是零度容忍。他在貪墨還是清廉這件事上有潔癖，他總希望他親手打造的社會沒有一個貪官，讓下層人都過安定的日子。所以，他容不得官員有絲毫貪污，貪一點，他就大開殺戒，幾近變態。朱元璋慨歎：「我欲除貪官污吏，卻奈何朝報而暮犯！」未嘗不是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還是在於先進制度的支撐。 網上圖片

因此說，社會公佈的貪官數字，很難預示着什麼，任何時候它都與朝廷對貪墨者的容忍度有關，與及時有效的監督有關。反腐成效，最直接的要看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單純是數字。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還是在於先進制度的支撐。(識貪·之六)

浪漫這東西

浪漫這東西，是好東西，這誰都知道。但有時也未必如想像中那麼多彩。某君在母親節時與沖沖的給老感歡從沒浪漫過的媽媽大人送去鮮花一把，卡片上只寫了「永遠愛你」四個字。一輩子沒被人送過花的媽媽開始像受了驚嚇的小偷似的堅拒花店送花員進門，理由是那人肯定弄錯了。她說，我這麼大了，清清楚楚了大半輩子，你不可能這麼愛我名譽。當送花員不得已撥通媽媽電話讓她驗明了正身，她才驚魂初定。滿以為可以得到的媽媽讚許的兒子聽到的卻是「花錢買這沒用的東西，買豬蹄膀多好啊，好大一捆蹄膀沒了呢」的抱怨。那隻沒了的蹄膀後來被媽媽掛在嘴上肉痛了大半年。某君由此感悟女人的浪漫是得和實用相結合的。

轉眼某君的太太生日，吃了一頓長了一智的某君花大錢給經常嫌廚房油煙大的老婆買了一口進口無煙炒鍋。提鍋回家時，某君已作好了接受老婆大動靜纏綿的心理準備，不自覺地層層甚至重操起了小曲，又想到老婆一高興晚間可能意外安排的餘興節目，腳下那個輕快心裡那個癡狂一高興呢。某君果然被餘意外了，他沐浴着太太炒鍋一般的臉色在小房間獨臥思過整整一個禮拜。最後以他買一口鍋的錢也就是相當於買一頭豬的錢給老婆重買了一套穿起來像沒穿的內衣才重獲回歸主臥的權利。有心浪漫的某君從此給女人送禮只送赤裸裸的人民幣了。

很多時候，浪漫的感覺源於女人的誤會。女人以為是偉大愛情，男人其實只是找個樂子逗你玩罷了。當女人滿懷柔情地憧憬着如何與夢中情人廝守終生時，男人說不定正盤算着怎樣盡



嚴陵灘頭話隱士

黃梅季節，七里瀧的水面特別浩淼，雨中從子胥渡、桐君山，一路雲山霧罩地到了嚴子陵釣台，看不清兩岸的景色，就想起了明朝的「江山船」。『江山船』又叫「九姓漁船」、「花船」。朱元璋得了天下，懲罰九姓屠虜，只許他們居住在水上，為了生存，他們的女人就幹起了唱曲陪酒的營生，以後商旅改道了，他們也在七里瀧消失了。不過，經歷了近二千年，在此隱居過的嚴子陵，卻沒有隨着他的消失，而像「江山船」那樣，在遊客的記憶中消失。

光武帝劉秀當上皇帝後，於公元29年下詔，派人四處尋訪同窗好友嚴光。有人看見嚴光「披羊裘釣澤中」，於是備車備禮，以皇帝的名義去邀請他，但返了三次，才把他接到首都洛陽。據傳，嚴光和劉秀見面，兩人暢敘舊情，相聊甚歡。是夜，兩人抵足而眠，嚴光在入睡後把腳擱到劉秀肚子上，劉秀也沒在意。為留住嚴光，劉秀還封了他「諫議大夫」之職。無奈，嚴光不接受。朋友相見，聊完了可聊的，他即告辭劉秀，回到富春江七里瀧一帶，去過自己耕田垂釣的日子。

諺語所謂：「察知淵魚者不詳，智料隱逸者有殃」，劉秀對他的離去，採取了心照不宣的態度。沒想到，千餘年後卻惹惱了洪武帝朱元璋，他特地寫了一篇《嚴光論》說：「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今之所以樂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疏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遊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忘志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正是：天大地大不如皇帝大，參親娘親不如皇帝親，沒有皇帝創造了條件，嚴光能夠悠閒釣魚嗎？現在授給他顯赫的爵位，他卻拒絕接受，這不是在侮辱皇帝嗎？顯然，光武帝比他更有涵養，因為把此話挑明了，最起碼是向天下公示了：有人在蔑視自己，不認同自己的豐功偉業！

朱元璋的《大誥三編》裡，有一段對不肯出仕而砍了手指的夏伯啟說的話：什麼叫做再生父母？他自問自答道：人遇上大災難，快要死了，有人及時把他救了。這個人，不論他是男女老幼，都是被救者的再生父母。現在你卻把自己的手指砍掉，不想為他所用！這當然就必須「爾宜泉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了。

范仲淹在《嚴先生祠堂記》分析說：「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徵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徵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同時肯定了嚴光和劉秀；王安石則說：「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跡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鱸膾地，放身滄海亦何求。」以為嚴光的要求比較高，遇到周文王那樣的明主，才肯出仕。北宋張綬